

历史会终结吗
历史怎样终结
历史的终结者会是谁
本书一家之言，娓娓道来
甚是有趣而又发人深省

半部《老子》治天下

——西方文化反思与美国价值批判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孙昌育 著



美国政府智囊之一、著名学者福山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历史的终结》，宣扬美国价值与美国文化，断言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及形式将终结于美国。

本书作者针对福山谬论，致力于通过“发掘”中国先哲特别是老子的思想资源，来颠覆美国的话语霸权，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

ISBN 978-7-5360-5913-9



9 787536 059139 >

定价：35.00 元

半部《老子》治天下

——西方文化反思与美国价值批判

孙昌育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部《老子》治天下：西方文化反思与美国价值批判 / 孙昌育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360-5913-9

I. ①半… II. ①孙…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西方国家②老子—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D569②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3411 号

责任编辑：蔡 安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75 1 插页

字 数 44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 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b.com.cn>

导言 反者道之动

1. 亢龙有悔的时代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应该自觉地让命运领着走，而不应该痛苦地让命运拖着走，问题在于什么是命运？

命运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道”。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道相当于宇宙的发动机，万物的蓬勃生长都是道的生动体现，人也是道的产物。但是，道还有另一面，“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第16章）。在老子看来，道具有阴与阳两种性质，道生万物为“阳动”，万物复归于根为“阴静”。人们很容易发现宇宙的阳动性质，因为阳呈现在事物的表面，只有智者才能洞悉宇宙的阴静。现代天文学通过光谱“红移”现象很容易断定宇宙在扩张，但要断定宇宙的收缩，则需要高度的智慧。

老子是古代的智者，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16章），他看到了万事万物运行的另一面，即“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一个智者提出的观念，往往是反向思维，在凡夫俗子看来，这些智者是唱反调的。老子的哲学就是“反学”，“反者道之动”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反”者“返”也，人类文明的发展太过分了，需要返回、归根。这不仅是解决文明弊端的根本方法，也是宇宙本身的节奏。霍金在《时间简史》把宇宙解释为轮回，宇宙从一个质点发生爆炸，不断地膨胀，但最终宇宙会收缩，最后返回到质点。

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直线的，它一定遵循着宇宙的节奏。雅斯贝尔斯对人类历史的节奏是有深刻感受的，他认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他所说的轴心期是指公元前5、6世纪，即古希腊、印度的佛陀时期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的确，轴心时代产生了人类智慧的所有元素，这些元素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直线论，一类为循环论，而且循环论是主流。印度人的智慧全是循环论，我们几乎找不到直线论的踪影。古希腊的哲学家也大多是循环论者，如泰勒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最终回复到水，柏拉图认为灵魂来自理念世界，最后又返回到理念世界，其他哲学家也大致如此，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例外，他关于质料到形式、潜能到现实的发展观念是直线性的。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基本上也是循环论，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法先王”，来使文明回复到过去，例如，孔子效法周公，墨子效法夏禹，老庄效法得更远，效法到文明前的自然。只有韩非是个另类，是个直线论者。他反对效法先王，把法古者视之为守株待兔。

一般来说，在宗教、哲学领域，循环论为主流；在世俗、政治领域，直线论为主流。所以，韩非在哲学界虽然不是主流，但他绝对是世俗的主流，中国历代统治者表面上尊崇孔子，但骨子里是

遵循法家的。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世俗中也是主流，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这一思潮由于与科学结盟而占据着现代思想界主流的位置，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与英国的经验论传统是有关联的，而这种经验论传统渊源于亚里士多德。韩非、亚里士多德之流是迎合世俗的，特别是迎合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但是，真正的哲学都是批判世俗的“反学”，真正的哲学家总是说逆耳的话，这些话像牛虻一样刺痛着文明。

司马迁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亢奋野心怀有深深的忧虑，他说：“《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司马迁《史记》卷79）“自返”，这是轴心期的智者所发出的呼喊，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文明的召唤。

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就是一条亢龙。西方文明在19世纪，曾经处于《周易》乾卦中“九五”的位置，创造了一个“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时代，但这个盛极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周文王所不愿看到的“上九”呈现在人们面前，亢龙有悔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所谓亢龙有悔，是指文明的过度发展而陷入困境。《周易》认为“升而不已必困”（《周易》序卦传），文明陷于困境，说明它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按照循环轮回的观念，文明应该往回走了。

《周易》既是哲学，也是占卜之书。“极数知来之谓占”（《周易》系辞上传第5章），这种占卜是神秘的思维，是面向未来的。

占卜真的不科学吗？不是。卡西尔认为，我们不太相信古人用占卜来预测未来的方法，但现在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精致的新的占卜术，它首先出现在德国的哲学中，这就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第一次企图去冒险地预定历史，它冒险地推断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尚未明了的阶段，特别是敢于对我们时代的唯一文化（它实际上在西欧和美国人能力达到完成阶段）和我们的星球进行预测。……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文明的产生、衰败和没落并不依赖于所谓的自然规律，它是被一种更高的力量，命运的力量所决定的。人类历史中的动力是命运而不是因果关系，斯宾格勒说，一个文化世界的诞生总是一种神秘的活动，是一种注定的命运；我们贫乏的、抽象的、科学的或哲学的概念对这些行动完全看不透。当一个伟大的灵魂从永远孩童似的人类原始精神性中觉醒过来，从无形式中分离出一种形式，从无限和永恒中分离出一种限制和宿命之物时，一种文化就诞生了……当这个伟大的灵魂已在民族、语言、教义、运输、国家、科学等形态里，实现了它的全部可能性，又回复到原始精神时，这种文化就死亡了”（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51～352页）。老子的哲学就是“永远孩童似的人类原始精神”，它是最伟大的保守主义，只有最保守的东西才是面向未来的，因为真正的未来，其实是回到过去。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有一本著名的书——《历史的终结》，这个终结不是回到过去。福山自认为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认为历史开始于血腥之战，胜者为王，这个战斗形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即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在福山看来，这一战斗的起因，并不是因为物质利益，而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这个精神的需要，就是柏拉图的所谓“气魄”。“气魄”就是一种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承认，这一欲望必须通过战斗来实现。只有通过生死之战征服对方，把别人变成奴隶，才能显示主人的骄傲和气魄。

但是福山认为，这种骄傲不能持久，因为让低级的奴隶来承认，是极其无趣的，只有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同等的人，骄傲和气魄才有意义。但问题在于，一旦别人和自己都成为同等的人，骄傲的气魄就不存在了。当气魄不再存在时，战斗就成为不必要的事情，贵族和奴隶的区别也就没有了。用尼采的话来说，历史发展到了现代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没有胸膛（缺乏骄傲与气

魄)的人。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指的这样一个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人们之间的差别没有了，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尊重，历史就这样终结了。

黑格尔是循环论者，他的绝对精神是循环的。精神经历了自然界、人类社会等阶段，最后通过黑格尔哲学回复到自身，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了自己，精神的运动是通过循环而终结的。

福山的书是从黑格尔出发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福山也是循环论者，他根本不想让历史“自返”。在《历史的终结》的结尾处，福山认为，各国历史的大篷车最后都会走上同一条道路，他这是在暗指美国道路。气魄也不可能在自由社会中消失，只不过这种“优越愿望”已经变得驯服和安全，不会引发战争了。“尽管大篷车的队伍最后大半都抵达同一城镇，乘客也许环视四周，依然对这个新天地感觉不满，而把眸光投向更遥远的全新旅途”(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这个“不满”正是浮士德式永不满足的心态，永不知足的现代人会让历史继续向前。可见，福山并不是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他要让历史继续向前。

福山关于的历史终结，仅仅是从政治上来考查历史运动，其实，历史运动还有经济和技术因素。人类的经济冲动并没有结束，资本的贪婪心造成了欲望与现实的差距，使人类会形成新的不满，浮士德式的技术创新，使世界始终远离平衡态，从而不断地把更为复杂繁重的社会结构创造出来。这种直线性的发展观，使得人类越来越背离生命，越来越远离大地母亲，历史并没有因为走上美国道路而终结。

老子学说从“道”出发，关于“道”，《说文解字》的解释是：“首者，行所达也。”道是由首和行构成，首为头脑，人类文明的行进方向是由头脑来决定的，问题在于：头脑的性质如何？它是阴还是阳？

道家的思想渊源是很古老的，它与“巫”相关联。远古时巫医不分，巫既是氏族首领，也是医生，因此道家既是治国的政治文化，也是养生的医学文化，这两者是统一的，自古以来，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一般来说，“动辄得咎”，动为阳，阳亢是容易出问题的，因此，中医的方子大都以清热去火为主。在现代医学中，体检化验单上如果出现了加号，就不是好事。阳为加号，阴为减号，加号与减号都有其文化内涵。

老子之所以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48章)，因为他觉得，文明的最好状态就是：由“阴”来主导的阴阳平衡，如果阴阳不可兼得，宁阴勿阳，宁做减法也不做加法。

道家出自史官，这些史官并不是做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他们是有倾向性的。他们都是尚古论者，信而好古，以古非今，把古代的阴静社会作为理想，以“古之道”来批判当下的治国之道。在政治上，以阴来制约阳、以静来制约动，这是符合道家的文化理想的。《周易》认为，阴在上、阳在下才是吉祥的“泰卦”，“道”作为头脑，应该是阴性的。

但是，孔子不愿意这样解释“泰”卦，他把文明的结构理解为一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周易》的64卦组成了一个圆圈，这样，“上卦”变成了“外卦”，“下卦”变成了“内卦”。其实，“内卦、外卦”的说法，很可能是孔子的发挥。相反，“上卦、下卦”的解释，是符合周文王的本意的，因为周文王对卦象的解释，常常涉及到上与下的交感。孔子的说法是为了解释文明的结构，外卦为阴，阴代表小人，内卦为阳，阳代表君子，“泰”卦就被解释成“内君子而外小人”。

虽然孔子关于“泰”卦的解释，未必符合周文王的意思，但孔子对“阳动”还是很警惕的。孔子认为，年少时戒之在色，中年时戒之在斗，年老时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篇)，一生都要戒。阳为动，阴为静。“色”、“斗”、“得”均为阳性，需用“阴”来加以制约。柏拉图哲学与孔子是接近

的。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胸部代表气魄，追求的是优越；腹部代表欲望，追求的是财富；头部代表理性，它意味着节制和中庸。他认为，让头部来统治胸和腹，可以约束胸和腹的非理性冲动，这是很理想的状态。

人到了老年，其智慧能够产生一个飞跃。孔子年过 50 才开始学《易》，其智慧也达到他一生的巅峰。他在论述伏羲八卦时认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周易》说卦传第三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

从伏羲八卦的方位图来看，天道是左旋的，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地道是右旋的，即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许中国占人早已知晓地球是圆的，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体和地球的运行正好相反。如果把天道左旋看作“顺”，那么地道右旋就是“逆”。宋代易学大师邵雍认为，若是顺天而行，这种左旋所得到的卦象，都是已生之卦，所以孔子说“数往者顺”。若是逆天而行的右旋，所得到的都是未生之卦，这就是所谓的“知来者逆”。“来者”就是未来，“逆”就是反，未来就是反者道之动。

历史（“往者”）的运行就是天道，是我们人类所无法逃避的宿命，它是“阳”的运动，但是未来（“来者”）所遵循的是“地道”，地道右旋，最后归结为坤。坤就是地，即汤因比所强调的大地母亲。

天道和地道的性质存在着矛盾。大地母亲代表人类的未来，她与天道是相逆的。逆者，反也；反者，道之动也。朱熹说得好，“《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朱子语类》卷 67），我们从《易经》哲学中，可以看出人类的未来是“地道”。

所谓天道就是乾道，它包含“兑、离、震”。

“兑者”悦也，它代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里比多，是一种寻求快乐的冲动，它推动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扩张。

“离”者火也，这是普罗米修斯在天国所盗取的神火，它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而带有反自然的性质。

“震”者动也，《说文解字》认为“动，作也，从力”；“力，筋也。治功曰力，能圉大灾”；“圉，圉圉，所以拘罪人”，人类的一切灾难都是由“震”这种阳动、创新所引起的，所以韩愈才会说“动辄得咎”。

地道是坤道，坤道则具有另外的性质，它包含“巽、坎、艮”。

“巽”在八卦中表示风，孔子在《易经说卦传》中认为“巽，入也”，它的意思是潜入，随风潜入，它不是靠强力来扭转人和事，而是靠软实力去感化或潜移默化。

“坎”表示水，在老子的哲学中，水只有柔的性质，它最接近于道，但是不能把水理解为软弱无力，它是一个太极高手，具有以柔克刚的软实力。

“艮”代表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是仁者，自然喜欢山。他之所以喜欢山，因为山在八卦中为艮，“艮，止也”，当大多数人贪得无厌时，孔子认为要适度，要懂得“止”，孔子虽然没有像老子那样，提出“反者道之动”的绝对真理，至少也提出了一个相对真理。

文明为“阳”，自然为“阴”。人类文明的最大问题在于“阳亢”，“阳”太多了。“阴”太少了，这是一切弊端的总根源。市场经济就具有阳动的性质，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如果没有阴静的因素来加以制约，必然会走到“亢龙有悔”的地步，文明将会在不断地狂热躁动中走向毁灭。

文明是需要约束的。在中国，有老子、孔子这种政治哲学来约束“阳”，西方文化则是靠宗教

来约束“阳”。中西智慧虽然在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反本归真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人类必须“返回”，这体现了“反者道之动”的精神。

英语“religion”（宗教）一词的前缀“reli”为信赖，可靠，而“re”的意思为又、再、重、返回。只有返回才是可以信赖的。Lig 这一词根来自拉丁文，表示绑、捆，因此宗教的本来意思，就是将自己绑回到神身边。在“宗教”一词里，“捆绑”这一词根包含着微言大义。Lig 这个词根可以加上一个前缀 ob（相当于 to）转变为 oblige 或 obligate，其意思是使感激、使负义务、束缚、强制、强迫等。我们人类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自由了，没有任何约束，对自然（神）完全丧失了敬畏之心。

孔子与柏拉图都是以“中庸”来制约文明的，但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民斯为下矣。具有犬儒精神的老子认为，文明的发展太过分了，光“戒”还不行，还必须矫枉过正，因而才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老子之所以要返回自然，正是由于文明的过度，他认为，“道”应该具有“反”的性质，必须采取与人类文明相反的法则，才能去扭转文明。

老子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老子其实是最容易被西方文化接受的哲学家。西方文化渊源于“两希”，即希伯来和希腊，老子的思想与“两希”是相通的。

希伯来人具有原罪观念，一切始作俑者皆为罪。在老子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与希伯来文化相通的元素。例如，中国先秦诸子都认为，创造礼仪制度是古代圣人的功绩，只有老子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文明必然伴随着罪恶，这和以色列先知的原罪观念如出一辙。希腊人具有“黄金时代”的观念，把远古当作最美好的时代，以后的历史是每况愈下，老子也是这样认为，最远古的自然是最好的。希腊属于印欧文化，他们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老子的时间观念也是循环的，反就是返回，人类是可以回到过去的。

但是，犹太人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这样的时间只能走向未来，不能回到过去。罗马人接受了基督教后，也把犹太人的线性时间观念接受下来了。这样，最初的那个黄金时代回不去了，线性的时间观念让人一直向前，无法返回。线性的时间只能让人一条路走到黑，只有循环的时间观念才能够让人重返伊甸园。西方人应该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的循环论，才能获得拯救，而老子哲学可以把希腊的古老智慧重新激活。

黑格尔说：“地球精神在它形态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变为沉静的充满力量的实体，但另一方面又变成精神酵素；前者变成养育万物的阴性原则，后者又发展为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的富于自身推动力的阳性原则。”（《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 79 年版 210 页）

黑格尔认为“阳性原则”是被寒冷逼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思想。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与第四纪冰期的消长有关。虽然地球在一万年前进入了温暖的间冰期，但其间依然会出现小冰期的情况。小冰期所带来的严寒，使地球显得“阴”气逼人，阴极而生阳，文明为“阳”，是由严寒启动的。

阴为静，阳为动。“阳”的实质就是能源和运动，可以简称“能动”，文明就是能动性的表现。人类文明就是趋向于阳（能源）的运动，人类与动物相比，要消耗更多的能源。特别是近几百年来工业文明的运动更是如此，人类所使用的能源越来越多，使我们的文明变得很过分。今天，全球气候已经变暖，自然界已经是“阴”退“阳”进，再加上文明的“阳”，必然是“阳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阳极必然生阴，阴静思想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回到老子去”，势必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

在 20 世纪，借助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了熵的观念，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使当代西方社会从熵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文明，罗马俱乐部为了抑制阳动的现代文明，提出《增长的极限》，这是有道理的，当地球能源耗尽时，可怕的“热寂”将毁灭一切。这表明：人类文明从阴极生阳开始，经过几千年达到顶点，即将转入阳极生阴的阶段。但是，我们的文明依然保持原有的惯性，没有为阴静社会的到来作准备。

2. 艺术比科学更真

老子的《道德经》是历史哲学，但同时也是诗，老子是用艺术的方式来反思文明的。老子认为“有”来自于“无”，最后回复到“无”，这与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所揭示的宇宙性质完全相同，但人们总是说老子的观念缺乏证据，是不科学的。其实，思想家就是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就像先知的启示，根本不需要证据。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有这段话了，“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们研究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人类生命现象。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确立了的事实的比较研究来阐明一些一般的‘法则’；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54 页）。英国人通常是很“科学”的，这是一个产生过牛顿的国度。汤因比虽然是英国人，但他对所谓的科学方法似乎并不感兴趣，却对“第三种方法”、虚构的艺术方法情有独钟。这不大符合英国人的思维。

英国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写下了著名的《新工具》，他拒绝了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演绎法，把归纳法推向科学的圣殿。他提出“四假象说”，其中之一就是剧场的假象，他认为，超验的形而上学并不是科学，它只不过是一场戏，尽管它十分精采，但那不过是艺术的虚构，是欺骗人的假象。

培根是片面的。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世界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19 世纪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杂乱混沌的，人们从中抽取一些片断，拿它们作为原材料，来建构关于世界的观念。世界是可以塑造的，而且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塑造，因而世界是多元的。理性只不过是建构世界的方法之一，人们也可以用艺术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乃至神学的方式来建构世界。

艺术的方法更加接近于神学，它更多地依赖直觉，而较少地诉诸理性。柏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去掉理性，才能看到更深入的东西。尼采也认为，只有在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引导下，达到“恍兮惚兮”的境界，才能接近和理解生命。

汤因比希望拯救西方文明，他寄希望于中国，认为中国能够拯救现代文明，这一观念听起来更像是艺术，而不像是科学。汤因比的说法，很容易引起一些中国精英的非议，好像他在说胡话。

问题不在汤因比，而在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模式，这种所谓的理性使我们中毒太深，它使我们必然要排斥、抵触艺术型的思想家。这种理性思维模式是亚里士多德带给我们的，他的逻辑强调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把我们毒害了两千多年，使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德尔图良的那句名言：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舍斯托夫认为：“哲学不应与逻辑有任何共同之处。哲学是一门艺术，它力求挣脱思维逻辑的锁链，把人带到幻想和幻想性的无边大海之上，在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同样既可能又不可能。”（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无根据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很明显，一流的历史学家采用艺术方法，这是汤因比所赞赏的方法。二三流的历史学家往往采取科学的方法，他们把堆积如山的史料当作出发点，然后再去寻找所谓的“规律性”。只有像汤因比这样的一流历史学家才具有大智慧，他在《历史研究》中表述的是思想，而不是史料。思想在本质上是艺术，而不是理性。

中国流传下来的许多正史，其实是不可信的，因为写正史的人都太理性，倒是民间的野史小说是可信的。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真实，只有大历史学家，才会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述历史。《史记》中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那其实是司马迁在写小说。

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说过，史书讲假话，但人名地名是真的，小说讲真话，但人名地名是假的。据英国的一项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是虚构的，一半的受访者认为12世纪的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是虚构的，却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是现实人物（见《参考消息》2008年2月5日第3版）。小说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更适合去表现思想。“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常常会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红楼梦》的第二回，贾雨村在智通寺门口，看到一幅破旧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认为其“文虽浅，其意则深”。脂砚斋在此写道“一部书之总批”（邓遂夫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113页）。曹雪芹是写末世的高手，他在《红楼梦》中表述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业化处境，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工业技术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人类贪心依旧，继续寻求发展，使外部生态和内在心态都陷入困境，从而难以回头。

《根》是一部美国小说，它也是用文学来表述思想的。它被美国图书基金会授予了历史特等奖，基金会似乎没把它当作小说，反而认为它是一部“非虚构的历史作品”。它在全世界的流传表明，人具有强烈地追溯过去的冲动。《根》对美国黑人的根进行追寻，这条根在1750年的西非的冈比亚河。那时非洲部落的生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民风淳朴，社会和谐，人们处于完美的阴静状态。黑人被贩卖到美国后，他们的非洲之根被斩断了，他们痛苦地被纳入了文明。

“反者道之动”所表述的就是这样的冲动。反者，返也。天道和人心都是趋向于返回。文明则是坚持面向未来，让人类走向一条不归路。

今天我们总是用“进步”这一尺度来衡量各种文化，按照这一尺度，非洲是野蛮的，美国是文明的。18世纪的哲学家推崇理性主义文明，极力夸大史前社会的恐怖，说什么那是“丛林法则”，“人对人像狼一样”。其实，史前社会并非如此。这些恐怖的描述，如果用于白人对黑非洲的掠夺、以及对美洲印第安人的驱赶，倒是十分贴切。

人类能够回去吗？今天的美国黑人真的能够回到非洲吗？

我们知道，动物在人类的圈养下，经过几代之后，就失去野外生存能力，虽然大自然是它们的根，但文明斩断了这个根，这些动物变得害怕自然，只能依赖文明为生了。

但是，人与动物不同，人是有梦想的。文学就是作者的梦，只不过是一个白日梦。《根》中关于非洲情景的描写，是第一代黑奴的白日梦。在梦境中，他们的非洲之根就具备了“反者道之动”的意义。所谓“道”，就是头脑的行走，思想的漫游。文学和哲学一样，当它说“是”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应该”。

哲学像艺术一样，它表述的是“应该”，它和世俗的法则肯定是不兼容的。人们常常以世俗的客观法则，来谴责哲学的虚幻与空想，但所有智者都坚持哲学的这种性质。法国学者韦尔南认为，“希腊神话不仅接近于我们所谓的宗教，而且更接近于今天对我们而言的文学。……假如读者想进入到希腊神话中，就让他从已习惯了的思想范畴中出来：希腊的远古时代中，在文学和宗教之间，就如在虚构故事与被叙述的现实之间，在神话的神奇与在叙述中包含的神圣的本真性之间，没有这一道鸿沟，没有我们倾向于确立的这种不兼容性”（皮埃尔·韦尔南《政治与神话之间》三联书店2005年第262页）。

“我的使命将是，在希腊传说的传统中，梳理那些支配秩序的结构，更进一步地说，梳理那个隐藏在神话想象中的、在这一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作品中的智力构造（该构造按照着一种玩弄暧昧的定义和叙述的逻辑起着作用），而并不追求没有矛盾”（皮埃尔·韦尔南《政治与神话之间》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

从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极力倡导理性，但它的目的就是反对哲学。哲学是艺术，启蒙的实质，就是用理性思维反对艺术思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启蒙时代是一个用“头”立地的时代，这个“头”指的是理性。在那个时代，人们放弃了想象力，喜欢说“是”而不喜欢说“应该”，喜欢规律而不喜欢做梦。经过启蒙学者的大力宣传，到了19世纪，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历史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让时间具有一维性，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返回”则被当作可笑的幻想。

如前所述，“道”是头的行走。“头”其实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理性，另一面是非理性。启蒙学者只允许按照理性去思考，他们压制了非理性，把非理性斥之为荒诞、迷信。但是，生命的本质就是非理性的，被理性所压抑的另一面也会反抗。

在19世纪，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们也被称之为生命哲学，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它指出：理性使生命陷入困境。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在黄昏起飞的，这个猫头鹰就是哲学。19世纪生命哲学的出现，说明猫头鹰已经起飞了，它说明西方文明已走向黄昏和没落。理性所代表的科学乐观主义遭到质疑，人们终于明白，文明向高级阶段的演化是不可持续的，文明像生命一样，也具有周期，也会没落和衰亡。同时，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也盛行起来，认为西方文化高于其它文化的观念，开始遭到人们的嘲笑和唾弃，被视之为文化沙文主义。

非理性主义对理性史学也产生了冲击。人们发现，历史其实并没有规律，而是具有神秘莫测的一面，这是理性所无法解释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另有一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家（指米恩斯的《安第斯的古代文明》），也承认了我们所研究的文明起源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着二元，并且发挥了力量。他的研究先集中于环境问题，而结果却得到了对于生命神秘性的直感：环境……并不是文化形成的全部原因。……无疑地，它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无法下定义的因素，那是一个不可知的‘量’，显然是属于心理一方面的，无以名之，还是老实地称之为‘x’。……即使‘x’不是这件事里的最显而易见的因素，它至少也是最重要、最足以决定命运的事物”（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章学诚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文史通义·书教下》）。“撰述”指的是历史哲学，“圆而神”是历史哲学的基本方法，“记注”则是科学方法（方以智）。

汤因比显然是排斥“方以智”而倾向于“圆而神”的，他很愿意用中国的古老智慧来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他说：“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

‘阴’和‘阳’——‘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状，而代表‘阳’的是一团没有云遮的发射光芒的太阳。根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的活动时期。”（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传第5章）。阴者，静也；阳者，动也。这二者不可偏废，如果让工业文明的“阳”一直动下去，道就不成其为道了。牛顿的线性时间观和惯性定律让人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它不允许人类返回。牛顿定律不仅是物理学，它也是特定的文化。它在工业革命之后，成为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自认为代表全人类的利益。

人们常常认为，利益是推动历史运动的力量。但凯恩斯认为，利益的作用总是被人过分夸大，他更强调思想的力量。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是囤积型的，那个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鼓励人们为了生产而生产，凯恩斯的新经济学扭转了这种倾向，他把资本主义引入消费社会，成为口腔型的经济模式。这个转变说明，社会是可以被塑造的，人是符号动物，他可以崇拜一种具体的图腾，也可以崇拜一种抽象的思想。凯恩斯说得不错，实际上是思想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都是阴静的状态，汤因比认为，阳动只是历史中偶然的一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今天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并不是天然的，它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启蒙思想所塑造的。思想的产生是偶然的，由这些思想所塑造的世界也是偶然的。18世纪的某些思想家妄称，他们发现了普遍的、不变的人性，把他们偶然杜撰的思想体系视之为绝对真理。他们的蛊惑很诱人，因此有了许多的响应者和追随者。正是英法的启蒙学者杜撰了现代迷信，才造成了今天的世界。

世界并不是一个既成的世界，而是由头脑建构出来的。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一本著作《多元的宇宙》，他对所谓的“决定论”十分不满，认为这种哲学把现成世界看作唯一的世界，人在这种哲学中完全没有自由，成为被必然性操纵的木偶。他认为，实在并不是现成的东西，现实世界是可以被我们塑造的。马克思在欧洲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在《费尔巴哈提纲》中认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仅仅从客体的方面来理解，而不是从感性、从主体、从人们的活动即从实践的方面来理解。“客体”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它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在马克思的哲学中，知与行是合一的，思想可以通过实践造就一个世界，也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观念。道者，首也、行也，道既是头脑又是行动，是头脑支配行动。对于启蒙思想的那些天才们，我们千万不要迷信他们。今天的人类完全有权力来决定：是接受他们的世界、还是拒绝他们的世界。

一阴一阳的宇宙节奏，决定了我们人类的返回，决定了我们寻根的冲动。文明抬高了人类，使人类处于无根的状态，无根使我们无所归依。就人类本性而言，他不想在空中无所归依，他想返回，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归根就是回归自然。墨子见到染丝者而发出悲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文明就像一个大染缸一样，使每个人失去自己的本色，人变得很不自然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回归根本。什么是归根？老子说“归根曰静”，即放弃阳动回到阴静的状态。

黑格尔认为，世界是辩证的，有正题必有反题，那么，有现代化就会有反现代化。二战以后，现代化蒸蒸日上，成为主流话语，但反现代化思潮也席卷全球，长盛不衰，这是为什么？其原因在

子，现代化像一口的染缸，它使得每个人被迫放弃自己的本性，丧失了自我。现代化就像古代的苛政一样，人们不愿承受它的压迫，但又无法逃避。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今天的世界则是“现代化猛于虎”。物极必反，“反”就是道的运动。老子强调返回，他并不是要摧毁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而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14章）。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也希望用古代社会的传统来驾驭现代的文明，“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页）。马克思并没有像现代化的倡导者那样，把原始社会描述成难以忍受的贫困。贫困是文明的产物，文明前的人类社会没有贫困，最多只是俭约。

现代文明造成了无数弊端，每解决一个弊端，又会带来新的、更多的弊端，这让现代人穷于应付。现代人热衷于解决鸡毛蒜皮的问题，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是什么？路线就是老子所说的“道”。道“从首”，“首”就是思想，人类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思想，思想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思想路线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题在于，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汤因比说，历史的多种动因隐藏在神秘之中，这是人的智力所无法把握的，但他还是从历史中确立了一个有把握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地理环境，因此，他给自己的一部著作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人类和大地母亲》。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虽然“道”是无法言说的，但老子也提出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人们只要效法大地就可以了。这个“大地”不能理解为全球化的那个大地，只能理解为人们周边的大地，因为老子是主张“小国寡民”的。

各种生命都依附于周边的大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会创造出多余的东西来，与环境天人合一。唯有现代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本性，他们不去消费身边的资源，一定要消费大洋彼岸的资源，人为地增加碳排放，还美其名曰“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后，环保意识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具有阳动的性质，它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生态文明是一种阴静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反动。“反动”者，“反者道之动”。这个“反动”是必然的，它就是道。过去，“反动派”是个政治概念，是个贬义词，今天应该为这个词正名。所谓辩证法，就是让正题产生反题，就是事物产生出否定自身的因素。工业文明也会产生出否定自身的因素。今天的“反动派”来自工业文明自身，它是批判的、革命的。

生产力曾经是文明的尺度，今天，文明程度要由生态环境来作为衡量标准。生态文明要求废止当今美国式的豪华生活，回归简约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不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且它也为走向反面创造了条件。现代人类所达到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为全人类提供一种既衣食无忧、又没有过分剩余的充足经济。放弃奢华、返璞归真的生活，这是一种很“艺术”的生活。这个“艺术”不是虚幻，它是更高级的真实。

3. 气候决定文化

梁漱溟曾提出“文化三路向”的观念。他认为生存“意欲”是人类的本性，但意欲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他概括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意欲“向前要求”，第二种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第三种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这三种意欲形式是各文明所作出的自我选

择，是“文化三路向”；西方文明选择了意欲“向前要求”，中国选择了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选择了意欲“反身向后要求”。

梁漱溟所说的三种文明，它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按照孟德斯鸠说法，这是由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来决定的。而气候又是由什么来决定呢？是由太阳来决定的。中国哲学把“阴”当作静止的因素，把“阳”当作运动的因素，这是很深刻的。太阳是最根本的阳，是一切阳的源泉。太阳不仅决定了一个事物“阳”的状态，而且它还决定一个事物“阴”的状态。例如，阳光充足的南方是很“阳”的状态，缺乏阳光的北方是很“阴”的状态，这使得南方与北方在人性上有很大差异。

西周末年的伯阳甫用“气”的阴阳来解释地震，这对中国哲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气”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上，一直是个最重要的范畴，因为气的阴阳决定了事物的运动。

老子同样认为，气的阴阳造成两种因素的交感，从而使事物运动。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负者“恃也，从人守贝，有所恃也”，抱者“引取也，从手，从包”（许慎《说文解字》）。“负”是承担、背负的意思，“抱”是获取、追求的意思。

如前所述，太阳不仅造就“阳”，也造就“阴”。地球上的冷热不均，都是太阳造成的，不同纬度的居民，其阴阳状况是不同的，南方阳多，北方阴多。人需要进食，就是需要获取能量，能量为阳。南方阳多，食物也较多，北方阳少而阴多，所以食物缺乏。虽然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但世界各地“负阴”（缺乏食物）的程度是有差别的，所以“抱阳”（获取食物）的冲动也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就是南方与北方的差别。

南方这一地理方位，在《周易》中为离卦，离代表火和日，南方的“阳”（食物）是充足的，缺乏“抱阳”的冲动，因此南方民族没有征服、掠夺的欲望，他们很懒散，不喜欢动。反之，一个民族如果处于北方，远离太阳，阳少而阴多，就会产生强烈地“抱阳”冲动。阳的实质就是动，有了“抱阳”的冲动，必然是“意欲向前要求”，北方人很喜欢动，所以必然会走上远征的道路。

在欧亚这块大陆上，历史的启动与雅利安人的好战有关，好战又是与气候有关的。四千多年前，雅利安民族处于高纬度的寒冷地带，在正常年份，他们勉强能够生存，但是，一旦出现一次小冰期，造成气温的下降，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而他们对于光和热较多的南方地区，会产生“意欲向前要求”的觊觎之心。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扩张是必然的。

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南下灭掉了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于印度之后，久而久之，成为印度的原住民，其扩张冲动也消失殆尽。他们已经处于阳多的地区，不再需要像北方寒带民族那样“意欲向前要求”，反而需要克服炎热和躁动，需要清静养火，所以产生了清心寡欲的印度教、佛教。

文化是人们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类选择阴静文化还是阳动文化，这和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纬度地区有关，人们总是追求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严寒的北方导致夸父逐日，北方人很躁动。南方气候炎热，人们都寻找阴凉的地方，懒洋洋地不想动。消极无为的观念是南方的炎热气候造成的，所以，南方的民族不会去启动历史，历史是由积极进取的人启动的，是由北方人启动的。马克思说得不错，印度没有历史。

阴极生阳，阳极生阴，老子早在两千年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燥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45章）。这话的意思是，人类之所以“躁动”，是为了克服严寒气候（“燥胜寒”），人们之所以寻求“清静”，是为了克服炎热气候（“静胜热”），但这个世界最终归于

清静。老子终究是南方的思想家，他说“冲气以为和”。“和”是什么？和“从禾”，禾是水稻，是南方的农作物。这说明：阴阳“冲气”的结果，不是北方游牧价值的胜利，而是南方农业价值的回归。

一个民族所追求的东西，往往是其地理环境所缺乏的东西。把我们的亚洲近邻印度和日本作一个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种国民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南方的印度阳盛，物产丰富，因此印度人反而喜欢做减法，倡导清心寡欲的宗教，从不争强好胜。而北方的日本阴盛，生活匮乏，就会产生厚生的愿望，他们喜欢做加法，所以日本政府有一个负责国计民生的部门，叫作厚生省。日本人敢于“出生入死”，讲究武士道，这是为什么？老子早就给出了答案：“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老子》第50章）。

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人像工蜂一样勤劳，像兵蚁一样勇敢，其国民性格越来越强悍。同样，地理气候决定了印度人的消极无为，其国民性格越来越软弱。从印度人的挨打性格和日本人的侵略性格，可以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别。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意欲表现为“自为调和持中”。之所以如此，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既具有北方气候元素，又具有南方气候元素，所以，中国成为倡导中庸之道的国家。当然，一个社会所倡导的东西，恰恰是这个社会所缺乏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其实并不中庸，总是在非阴即阳、非左即右之间摇摆不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气”本身是变动不居的，中国的温带季风气候变幻无常，使这块大地上有时候刮西北风、有时候刮东南风，所以中国并不中庸，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南北温差很大。这种气候差异，不仅造成了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也造成了南方与北方在哲学上的差异。北方人“意欲向前要求”，他们必然要扩张。扩张需要强大的力量，只有大集团才有力量，因此中国北方的思维方式是大一统的，它要消除多样性，寻求统一性。儒家和法家都是北方的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文化民，法家主张以法制民，都是为了实现大一统。南方的道家则是“意欲向后要求”，生存资源的丰富使他们寻求精神的逍遥，主张去掉约束人的礼仪文法，顺应自然。与北方的一统不同，南方思想家主张小国寡民，因为大一统没有自由。

中国文化是矛盾的。一方面，南北温差很大。北方气候寒冷决定了北方的强悍，决定了北方对南方的统治地位，北方的政治哲学必然成为主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冬季虽然温差很大，但夏季普遍高温，不仅南方需要防暑降温，北方也需要避暑山庄。因此北方统治者也需要南方阴静的思想，让“静胜热”。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尽管推崇儒家和法家，但也能容忍道家的存在。

整个中国版图是一个大风水，风与水相比，风更主动，各地的水都是由风带来的。中国的冬季是西北风，夏季是东南风，这是《周易》所赞赏的阴阳交感，这使得中国南北思想出现相互渗透与融合，地理气候条件导致了文化的综合性。

虽然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文明具有综合性、包容性，但就其本质来看，中国是农耕文明，这是南方的文明。

南方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最适合于农作物的栽培，南方农业的出现肯定比北方早。从今天的考古发现看，南方洞庭湖地区在1万年前就有水稻栽培，比黄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的黍粟栽培更早。炎帝、黄帝属于华夏集团，这个西北民族最初是过游牧生活的，他们沿黄河两岸迁移，黄帝在北，炎帝在南。炎帝之所以被称之为神农氏，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农业，而是因为他的进军路线在

南方，最早接触到南方的农耕文化。农业与其说是他发明的，不如说是他引进的。中国文字是华夏族创造的，历史文献是由华夏族写的，他们自然把农业的发明专利归功于华夏族的炎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华夏族被南方的农耕文化改造了，原来的游牧生活被放弃了。

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南方性质，而南方文化是具有感召力的，历史上中国曾多次被北方游牧族征服，但最终都是中国文化消化了北方游牧族，如北魏、满清最终都被农耕化了，农耕化即是南方化。所以老子说“冲气以为和”，“和”通“禾”，禾是农作物，可见中国文化归根结底是农耕。

英国人是北方蛮族，寒冷的气候使他们成为近代史的推动力量。他们从海上来到中国，发动了一场鸦片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耕文化似乎失去了消化北方列强的能力，李鸿章认为，这是中华文明三千年所未曾遇到之大变局。面对这个无法消化的北方蛮族，他只能遵循魏源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个主张其实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一些所谓精英，与李鸿章比起来，真是不及远矣。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制夷”，今天精英们的洋务运动是为了“制于夷”。所谓“制于夷”，就是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按照福山的愿望终结历史。

福山的愿望是什么呢？福山认为，“黑格尔宣称历史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拿破仑与普鲁士之战）之后结束，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因此主张自由国家在世界上的胜利”（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83页）。然而，福山所崇拜的柯杰夫却能够“创造性地活用黑格尔的思想，以加深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柯杰夫指出黑格尔的主张本质上是正确的：世界史过去经过种种迂回曲折，其实在1806年（耶拿战役）已有效地结束……换言之，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自由平等原则已体现在柯杰夫所说近代‘普遍均质的国家’里，由这事实观之，可知人的意识形态发展已达到不可能往前推展的地点”（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86页）。“柯杰夫说，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原理已完全实现的都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国家，也就是拥有高度物质丰足与政治安定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因为这些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的基本的‘矛盾’。在这自我满足又自立的社会里，没有应该拼命追求的更大政治目标，只一心一意从事经济活动”（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87页）。福山认为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自豪地说，“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归宿吗？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而绝对精神的体现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个特定时代，会选择一民族作为自己的代表。例如，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它选择了意大利；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它选择了英国；再后来，绝对精神选择了美国。

绝对精神的运行方向是不断向西，而地球是圆的，在美国独领风骚之后，自然该轮到亚洲了。二战后，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不是偶然的，这是时运流转的结果。亚洲人手中的接力棒来自美国，但亚洲人误以为自己的时运来自美国的恩典，所以，整个亚太都对美国情有独钟，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历史其实是一个圆圈，亚洲人拿到这个接力棒后，应该返回到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跑。历史转了一个圆圈后，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回到历史启动前的阴静。老子早就说过，“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正是南方的风水所产生的思想。

历史是由北方的风水启动的，但历史只能由南方的智慧来终结。几百年的工业文明使全球变暖，几十亿人口处于躁动之中，这必然要求以“静胜热”的智慧。中国文化具有南方性质，应该借助这个时运机缘，向世界推出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消解自己的文化。